

香港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研究

李沛良

编者按:还有三年香港主权就将回归中国,本期特发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沛良博士的这篇系统介绍香港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研究状况的文章,以供各方读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社会学同仁了解。本文原发表于1993年12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三地社会学的发展与交流:民间的学术文化与展望”研讨会,现征得作者和该会主办者的同意后刊于此。本刊并希望台湾、澳门地区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也能为本刊提供本地社会学研究情况的文章和信息,以便交流,增进了解,共促社会进步和社会学研究的繁荣。

一百五十多年来,香港是一个由英国人统治的华人社会。其社会学的萌芽与成长,约有40年历史。各方面的情况,可参 Lee (1977, 1987)、Traver (1984)、黄绍伦(1992)和 Lee & Lau (1993)等著作。本文将集中讨论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并分析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受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所影响。

香港社会学之学术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50年代和60年代的移植时期;2. 70年代的本土耕耘期;3. 80年代开始的繁衍期。每个时期的社会学研究,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

社会学的移植

50年代以前的香港,鲜有社会学研究。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学,当时是唯一的高等学府,也没有社会学的传授和研究。

50年代开始,在香港开拓社会研究的是一群来自西方的学者。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西方学者难以踏足中国大陆,于是转而到香港进行社会研究。他们大多是来自英、美的社会人类学者,例如 E. N. Anderson、Hugh Baker、Maurice Freedman、James Hayes、Jack Potter、Marjorie Topley、Barbara E. Ward 和 James Watson 等。香港既是一个由英国人统治的社会,西方学者来香港做研究,就较容易获得政府的安排和协助。同时,集居于市区和散布于新界农村地区的华人,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适合于研究中国人的场所。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大多选择新界的农村地区进行田野研究,应用历史文献和通过参与观察及非形式访问,深入观察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和生活。研究的课题,包括宗族制度及家庭组织、社区权力结构、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风水及阴阳五行等传统观念、经济生活的变化、饮食及医疗的行为等。(参 Jarvie 1969; Topley 1969; Freedman 1976)。他们的著作

颇受西方学术界重视,但对于日后本地社会学者的影响不大。(Traver 1984)

香港在 50 年代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商埠,城市区域范围小而且生活平淡,农村地区面积广阔但生活也是宁静的。自 60 年代开始,自中国大陆来港的移民骤增,新兴工业随之而涌现,城市范围也迅速向新界的农村地区伸展。(Dwyer 1971; Lin, Lee and Simonis 1979)在此时期,有些西方学者开始从农村社会研究转移到工业与都市社会的研究,例如 Barbara E. Ward (1985)研究工厂的内部组织与工人行为,Craham Johnson (1977)研究新市镇的政治结构与民间组织,Janet Salaff (1981)研究妇女就业与家庭关系对工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此后本地社会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工业都市化的过程,这些西方学者的成果也就较受注意。

Barbara E. Ward 是最早到香港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对本地学术界的影响也较大。1950 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她曾多次到港,研究渔民的社区生活、儿童的社会化、传统戏剧的仪式与伶人角色以及小型工厂的管理文化等。在其论文中,经常突出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例如对经济互助、教育进取、勤奋工作、克己自制、家长主义、个人面子和人情关系的重视等。(Ward 1985) Ward 又根据其其对香港华人生活的长期观察,阐扬 Levi-Strauss 的意识模型(*conscious models*)理论,认为社群内各人的行为都会依据三个共同建立和分享的构思:1. “接近模型”(immediate model),即他们对自己社群所实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的构思;2. “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即他们对大社会的士绅或文人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理想的构思;3. “观察者模型”(observers' model),即他们对其他社群所依循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构思。Ward 强调,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应从社群所建立的意识模型出发,从他们的观点理解生活的规律和变化,进而分析各个意识模型的关系,并且比较各地社群的异同。Ward 曾于 1979—82 年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对本地年青学者发生较大影响,其文集也被翻译成中文。

除了上述的田野研究以外,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期也有西方学者(以美国为主)来到香港,深入访问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力求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家庭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经济结构,其中包括 Ezra Vogel (1969)、William Parish 和 Martin Whyte (1978)、Andrew Walder (1986)等社会学者。他们大多获得在 1963 年美国多所大学合资创办的“大学服务中心”的协助,包括安排访问移民和提供大陆报刊及其他文献资料。移民报导的正确性虽有疑问,但在当时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他们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因而倍受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至于本地社会学者,由于偏重香港社会的研究,反而较少引用当时西方学者的中国大陆研究成果。

除了西方学者以外,香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也接收了一批来自大陆的中国籍的移民学者。他们于 50 年代初期,在香港成立多所高等学府,包括新亚、崇基、联合和浸会等学院。在基督教会资助下成立的崇基学院,于 1951 年首先创办社会学课程。联合书院和浸会学院,皆于 1956 年开办社会学课程。至于新亚书院,则于 1959 年引进社会学课程。曾于 20 世纪前期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教育,(King 1978)也就随着这群逃难学者移植于香港土地上。可惜的是,当时在上述学府任职的社会学者,人数不多而且忙于教学,加以经费不足,鲜有进行实地研究。

本土的耕耘

60 年代中期,香港的社会学教育获得扩展的机会。当时的香港,需要专业人员协助工商业和社会服务的发展,再加以中文中学学生的人数众多但却难以进入以英文为授课媒介的香港

大学,于是政府在各方面的要求和压力下,决定在1963年合并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所书院,成立以中文为主要授课媒介的香港中文大学。

中大成立以后,除了使三个书院的社会学资源集中并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以外,还在美国Pittsburgh大学的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的协助下进行课程的改革,安排美国学者来授课并推荐毕业生到美国留学。(Lee 1987)当时,杨氏有感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式微,决定协助香港培训人才,为将来中国社会学重建播下种子。

为了开拓本地的研究,中大三所成员书院的社会学系于60年代中期分别成立研究单位。崇基位于新界,遂成立“农村研究中心”,以一个受工业都市化影响的农村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的田野研究;联合位于市区,于是成立“都市研究中心”,以抽样调查方法研究城市的家庭生活和邻里组织;新亚较重社会心理研究,于是成立“社会学实验室”,以实验法来观察和验证小群体成员间的交往模式。这三所研究单位,采用不同的研究策略和选择不同的研究范畴,起着互补的作用。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社会学学生提供实地研究的机会。可以说,其教育使命超过研究使命。

香港社会学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政府于60年代中期资助一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60年代初期,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人口急剧增加。同时,香港亦进入经济转型期,除了传统的转口贸易以外,制造业开始兴盛。香港不再是一个平静的小港口,而是一个人口密集和工厂林立的繁忙都会。种种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浮现,社会服务的需要也不断增加。香港政府为求搜集有系统的资料,以制订各项社会政策,决定于1966年拨款资助一项为期3年的“香港市区家庭生活”调查,由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来承办这个香港社会学史上首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该研究在1967年中以问卷方式访问了近4000名已婚成年人。研究的课题很广泛,主要是从交往形式及功能强度两方面分析夫妇的关系和他们跟老年父母、子女及其他亲友之间的互爱互助程度。(Mitchell 1972)研究的负责人是专程自美国请来的社会学家Robert Mitchell,可能是当时没有合格的本地学者。上述的家庭生活调查于60年代末期结束以后,数量化的抽样调查研究日益流行,本地学者也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主力。

从70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继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政府于是扩大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当时已有20年历史的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和刚于1967年成立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得以陆续增加社会学教师人数,并且相继成立硕士和博士课程。社会学师生人数的增加固然有利于发展研究工作,稳定的政局和自由的学风也是重要因素。香港虽然在1966—67年间经历了一次大暴动,但此后政局相当稳定,加以政府不但对经济领域施行“积极不干预”政策,(Lin, Lee, & Simonis 1979)而且对学术领域也保持同样态度,使得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得以发展。

一项关键性的变化,是中大在杨庆堃的推动下,于60年代末期将三所书院的社会学课程合成单一学系,且将前述的农村研究中心、都市研究中心和社会学实验室合并,成立规模较庞大的“社会研究中心”,并获得香港政府、亚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和岭南大学基金会等机构资助。中大社会学系及社会研究中心的发展,还在杨庆堃的引荐下获得美国华裔学者陈郁立和沈爱丽的协助。

社会研究中心以社会学研究为主导,但也兼顾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包括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大部分的研究是在香港进行的抽样调查,例如研究香港人的生育态度和行为、小贩活动及其社会经济意义、小工厂的管理及其经济作用、贪污的成因及其控制、拥挤的居住环境与华人的健康及适应方式以及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成因等。最庞大的项目,

是动员近 20 位社会学或相关学科学者的力量,在香港的一个人口急增的新市镇,进行一系列的文献分析、田野观察和抽样调查,以理解一个华人密集的工业化社区如何在当时政府所推行的西方制度架构中成长并发挥各项社会功能。(King and Lee 1981) 其时,香港政府为了解决人口剧增而带来的居住和就业问题,决定在市区边缘建立多个公共房屋和工厂林立的新市镇。可见,社会研究中心的上述新市镇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其实际意义。

香港社会研究中心的多项研究成果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注意,使本地社会学者的研究力量获得社会的承认。另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是社会研究中心集合了九名社会学者、一名人类学者和一名心理学者的力量,在广东进行人民公社调查,探讨这个崭新的集体组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李沛良、刘兆佳 1981) 研究结论之一,是认为这个推行公有化和具有广泛职能的大型组织原则上可以推动农村的建设,但不可过份强调权力集中、地方自足和平均主义,应重视专业人员并根据当地农村社会的特点来设计具体内容。该研究亦根据公社的经验,提出“组织集约”(organization - intensive)的概念,作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工具。由于现实的限制,这项研究不一定能够深入理解农村公社的运作,但它却标志着香港的本地社会学者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关注及对实地研究的开拓。

70 年代初期,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员也在香港积极展开实地调查,研究的课题有贫民的社会服务与住屋需要、青年人的社会态度、工人的生活质素、香港人口的特性和增长情况等。(Hopkins 1971) 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数量化的抽样调查方法。

总的来说,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香港社会学研究处于移植期,以西方的社会学者及社会人类学者为主力。他们大多采用田野考察或深度访问的方式,研究香港农村的生活,也有涉及工业都市的发展和从新移民中获知中国大陆的变化。他们极少在香港的高等学府任教,来港的目的是为了搜集资料。70 年代是本地社会学界的耕耘期,在高等学府任教的社会学者开始拓展实地研究,以香港的工业都市研究为主,大多采用数量化的抽样调查方法,同时也开启了对中国大陆的实地调查。

多向的繁衍

80 年代,香港的经济继续增长,社会生活和政治形势变得愈来愈复杂,社会学界也因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机会来发展学术研究。

首先,香港的经济结构再度转型,由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业。(Tsim Luk 1989) 同时,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由于中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收回香港,引发出一度令人忧虑的人才外流问题,尤其是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的外流。政府为了配合经济转型和应付人才流失的问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但扩充两所大学(港大和中大),而且设立第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加快其他高等院校的扩展,如浸会学院、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和岭南学院等,这些院校皆设有社会学课程。于是全港社会学教员的人数得以显著增加,其中不少是学有所成的年青学者,成为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时至今日,中大的社会学系仍是香港最具规模的学系,有教师 19 名,全是华人。至于香港大学的社会学系,有 12 名教师,约半数是华人。浸会学院的社会学系也有一定的力量,有 14 名教员。树仁学院在 1971 年开办的社会学系,规模较小,约有 4 名教员。至于其他高等院校,虽无社会学主修课程,但却开设多项科目,如两所理工学院的应用社会科学系、岭南学院的社会科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1993年初,中大社会学系为了举办“港台社会学者交流会”,发信收集上述8所院校的社会学教员名单及其学术背景。从复信的79人中,1.6成已有博士学位,共48人,其余有10人是博士学位候选人,有21人已取得硕士学位。2. 华人占9成,共71名,其中41人已有博士学位,10人是博士学位候选人,20人有硕士学位。在8名非华人中,7人已有博士学位,1人已有硕士学位。3. 根据他们的最高学位,超过5成(共42人)取自美国,次为英国(12人)、香港(9人)、加拿大(6人)、澳洲(6人)、德国(2人)和法国(2人)。4. 在各院校的分布中,以中大人数量最多,共24人,他们除了在社会学系任教外,也有在商学院、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等任教。

总括来说,在现今香港的社会学学术界,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多曾在欧美留学并已经或即将取得博士学位。香港高等学府的社会学教员在质与量方面的共进,大大加强了社会学研究的力量。再者,中大、港大、浸会和科大均设有社会学硕士或博士课程,有助于社会学研究的推进。

研究经费方面,也有显著增加。香港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使得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源,也使得社会对科技知识有更大的需要。于是,政府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增加对高等院校的拨款,并且于1991年初在“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下成立“研究资助局”,以加强资助和监察各个高等院校的研究工作。结果,多项大规模的社会学研究相继得到资助。

社会学学人的质量与研究经费的增加固然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但他们所受到的学术压力也促使研究数量的增加。近年来,各个院校除了加强教学工作以外,也日益重视研究的表现。研究著作的质量成为教员的实授和升级的重要标准。再者,香港的政制改革,促使影响力日增的民选议员和政治团体,不断要求政府增加其办事的透明度。受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就不得不急于加强其教研质素,极力争取政府与社会的支持。结果,各院校之间的竞逐日渐加强,而每所院校的内部竞争也随之而增加。在此压力下,社会学者在教学之外,必须加强其研究的质与量。

种种的原因,使得本地社会学的研究,自80年代开始即由耕耘期转入繁衍期,积极向多方面发展。在众多的领域中,以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发展最快。

80年代或以前,社会学者甚少注意政治研究。80年代初期,中英为香港前途所举行的谈判和英国于1997年如期归还香港的决定,引起民间的政治团体与政党纷纷涌现,政治争论与政制改革的问题,成为全港大众媒介最关注的事项,也成为老百姓的热门话题。百多年来所养成的政治冷感积习,逐渐加温融解。在此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政治研究就迅速成为香港社会学最昌盛的研究领域。高等学府的社会学教员及其研究生,皆有不少从事政治课题的研究,例如香港政局稳定的因素、香港社会的法律文化、香港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非殖民地化和权力转移的过程、新政治领袖的酝酿和冒升、民间政治团体的形成和策略以及政府公务员的角色转变等。(参Lau 1982;李明堃 1987;Lau and Kuan 1988;Wong and Lui 1992a;Lau and Louie 1993)香港大学于1990年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不断进行与政制相关的民意测验。

另一项获得广泛研究的领域,是香港华人的经济行为与工业发展。长期以来,香港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而且香港人普遍相信,1997年以后香港的繁荣安定及民主自由,跟其经济力量及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贡献,将有很大关系。香港的社会学界自然不能忽视经济结构与行为的研究,不但要研究中国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金耀基 1985;Wong 1988)更要理解香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例如劳资冲突、本地劳工的短缺和工作态度、外来劳工的社会适应、妇女的就业机会与模式、雇主的企业重组策略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及其社会影响等。(参Levin 1979;Cheung, et al. 1991;Leung and Chiu 1991;Chiu and Levin

1993;Lui and Chiu 1993)也有社会学者,研究邻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文化与工业发展的问题。

60和70年代的香港社会学流行家庭研究,当时的理论取向偏重核心家庭的内部结构和交往模式。(Cheung and Podmore 1974; Wong 1981)80年代的香港,家庭研究虽不及政治与经济研究的普遍,但未受忽视。只是研究范围有所伸张,较多注重分析扩大的亲属网络以及研究家庭与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服务的关系。(李明堃 1987;李沛良 1991)全球的妇女运动与性别研究的兴起,也使香港社会学者日益重视妇女角色与家庭转变的关系。(Cheung, et al. 1991; Lee M. K. 1992)

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也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主要领域。(参 Tsang 1992,1993;Wong and Lui 1992b;1993)研究的课题包括社会阶层的结构及测量方法、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社会流动比率及渠道、社会流动的自致与先赋条件、个人的流动经验及社会的开放性对其道德和实用价值的影响等。新近的一项研究,是比较在香港与其他东亚国家兴起的中产阶级,研究他们所具有的价值与抱负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也有香港社会学者到中国大陆的城市,实地调查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情况。

近年来,普及文化与青少年行为的研究也受到注意。香港的物质生活虽然不断改善,但政府及民众也觉察到青少年日益不满社会现实,而且看来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玩乐取向,反叛行为也颇多,有必要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课题包括青少年的自我评价和道德观念、家庭及学校的适应行为以及闲暇活动的需要和模式等。(参 Cheung and Tam 1984;Ng 1984;Man 1992;Cheung 1993)社会学者也尝试理解在香港日渐兴起的大众传播和普及文化的特性及其对青少年或其他民众的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影响。(参 Chan 1986;Chan 1991)

除了青少年问题以外,香港的犯罪率也随着现代化而增加,与此相关的不少社会学研究也应运而生。政府便曾在70年代中期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从社会控制的理论角度,调查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家庭及社会成因。(Ng 1975)此后还进行了不少与贪污、吸毒及其他犯罪问题相关的研究。(参 Lee 1981;Traver 1991)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更于1986年成立犯罪学课程,以加强教研工作。

在人口研究方面,香港社会学界在70年代较注重节育行为的调查(Ng 1981)及内部迁移的研究(Choi 1975)。80年代中期,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一度引起香港人移民外国的浪潮。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人继续移入香港,而越南难民又不断涌进。于是,香港的社会学界兴起了移民的研究。大部分是研究外移的模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且追踪移民外国的香港人,研究他们在外地的社会适应问题。此外,也有研究香港新移民的背景及其社会生活。(参 Kwong 1989;Wong 1992;Lam and Liu 1993)

医疗社会学的研究在香港也受重视。(参 Lee 1980,1985;Liu, et al. 1993)研究的课题包括中西医疗服务的评价和应用、基层卫生服务的发展、职业意外的成因和善后、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和应付生活压力的社会文化机制等。老年人的健康与社会支持以及爱滋病的态度及行为等,也有研究。

最后,值得介绍的是香港的社会指标研究计划。自1988年开始,中大、港大和香港理工学院联手进行两年一度的主观“社会指标”抽样调查,以追索香港的社会变迁和问题。(Lau, et al. 1991,1992)研究的项目包括生活满意情况、社会问题的态度、房屋与社会服务的需要、社会压力与精神健康、宗教信仰、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政治态度、法律文化、消费与大众传播行

为、就业与工作价值和社会意识等。为求补助这些主观指标的效用,中大社会学系最近成立了“社会资讯系统”,搜集香港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

总括来说,从80年代初期开始,香港社会学研究由以往的耕耘期转入繁衍期,得到较充裕的人力和经费,朝着多方面发展。

总结与前瞻

香港社会学自诞生而成长已有四十多年了,它的际遇与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本文侧重分析社会变化对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影响,但也附带介绍社会学教育的发展。至于学术界以外的研究,如政府部门、市场或民意调查机构、志愿社会服务组织以及政治或压力团体等所做的社会调查,在近十多年来的政治变化和经济演进的影响下,其数量也如雨后春笋,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综合来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学者,把社会学教育移植于香港,继续传道授业,社会学在香港这片由英国人统治的土地上才诞生。来自英美的社会学人则在香港开拓研究,以求理解中国人社会和中国大陆的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学的移植期,社会学知识分别从北方的中国大陆和西方的欧美流入香港。当时,本地社会学的教研力量单薄。至于来自西方的学者,鲜有参与社会学教育,但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积极且颇有成果,大部分以田野观察方法研究新界的农村社会或利用文献材料和深度访问移民的方法研究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

70年代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本土耕耘期。从6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面临急促膨胀的人口和随之而增加的对房屋与其他社会服务的需要。香港的经济也开始起飞,在传统的转口贸易上添加制造业的兴起,社会的经济资源及其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而增加。香港中文大学因此而建立且获得美国华裔学者的协助,大力发展社会学的教研工作;历史悠久的香港大学也开始加强其社会学的教研力量。

政府及学术界,为求解决人口增长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推动与都市化和工业化相关的社会调查,例如家庭生活、节育行为、民间志愿组织、青少年犯罪、小型工商业的运作以及房屋及新市镇发展等研究。同时,70年代的本地社会学界也有较多的力量承接社会研究的使命,开始展开耕耘的工作,以抽样调查研究居多。香港政府对学术界的不予干预,也有利于社会学研究的发挥。

从80年代开始,香港再次面临大变化。经济结构由劳力集约的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和高科技工业。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大。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收回香港,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经济转型带来人才的需求和政治变化带来人才外流的忧虑,促使香港政府动用其丰富的财力,大力扩展高等教育并大量资助学术研究。各院校的社会学教员及研究生数量大增,使香港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进入繁衍期。同时,政府积极推行“政制改革”,民间社会日益政治化。香港市民对政府资源运用的加强监察,也使各个高等院校日益重视研究成果,求取政府和社会的较大支持。校内外的压力,加速了社会学研究的繁衍。

社会政治化加上经济转型,使当代的香港社会学以政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最昌盛,次为经济动力和企业组织的研究。此外,家庭的扩大亲属网络、妇女角色和两性关系的转变、老人的需要和社会支持、青少年的心态与普及文化、犯罪与治安问题、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人口的移入与外移问题、个人健康与医疗服务以及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等研究,也有显著的发展。当

今的香港社会学研究,可说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多向发展。

除此之外,亚太地区在近年间的经济起飞,对香港社会学的发展也有影响。

亚太地区已逐渐抬头,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新中心。经济实力的增长,将会带动学术及文化地位的提高。处于亚太地区核心位置的香港,其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是充满机会的。以往的香港社会学研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的边缘社会学。随着亚太地区的近年变化,香港社会学界已逐渐加强其与邻近地区社会学界的联系。除了举办和参加多项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研讨会以外,愈来愈多的香港社会学者先后与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合作,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官僚贪污的模式和成因、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影响、工业结构的转型与劳动市场的调整以及政制模式与经济发展策略等研究。种种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将有助于东亚社会学的成长,有机会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的社会学研究中心之一,不用困守于西方社会学的边缘位置。

除了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联系之外,香港社会学者也注意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其实,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早于20世纪上半期即受到中国社会学界注意。(King 1978; Wong 1979; 韩明谟 1987)早期的香港研究,偏重应用西方概念和验证西方的理论。(Lee R. 1992)80年代以来,香港学者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学者的交流,使得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再度获得关注。1980年台湾首先在台北举办“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随后,香港学者于1983年、1985年、1988年和1993年相继组织四届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这一连串的研讨会,有各地的华人社会学者参加,并且出版论文集。(杨国枢、文崇一 1982; 乔健 1985, 1991; 黄绍伦 1991)社会学应该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引发了各地华人学者的深思和建议。(萧新煌 1986; 费孝通 1988; 李明方、黄绍伦 1992)近年来,更有人提出成立全球性的华人社会学,以加速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

近十多年来,除了印证西方的理论以外,也有不少香港学者尝试发掘香港社会或中国文化的特质,从而建立新的概念和命题,对当前的社会现象提出更合适的解释。例如,金耀基(King 1981)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概念,解释百多年以来香港政局能够维持稳定,乃由于殖民地政府利用议会与咨询委员会的行政架构,委任社会的精英进入决策阶层,因而吸纳和化解了本地的政治力量。随后,刘兆佳(Lau 1982)根据其城市家庭调查的资料,认为香港的政治稳定,是由于“功利家庭形态”使得市民在剧变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可以通过与其家人及其他亲友的互助获取所需,尤其是经济的需要,不用向政府施加压力。

1949年前后,有不少上海工业家移民香港,带动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黄绍伦(1988)以深度访问法研究这些移民工业家,提出“企业家庭主义”的概念,指出他们虽然在企业管理方面较松散,由于以家庭作为经济进取的单位,成员间的亲切维系和互相信任,使他们勇于创业和不怕冒险,所办企业得以在激烈竞争和变化多端的环境中获取骄人的成就。

早期的香港家庭研究,颇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偏重家户的内部结构,并且认为工业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核心家庭的增加。(Wong 1975)上述刘兆佳及黄绍伦的分析,显示现代社会的家庭研究,要注意家户与其他亲友的维系,也要分析其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李明堃(1987)更进一步怀疑西方的理论,认为没有足够资料证明香港家庭趋向核心化。他提出了“折衷扩大式家庭”概念,指出香港人为求适应地狭人稠和生活紧张的现代都市环境,当会普遍成立自主权较高的核心家户,但不会放弃亲戚关系的维持,并且愿意承担义务。香港的交通和通讯发达,也有利于在不同地方居住的亲戚维持紧密接触和互相帮助。

李沛良(Lee 1982)曾在香港进行多项中、西医疗服务的调查,并将香港的情况与其他中国社会比较,提出“层序性医疗多元形态”的理念模式,以分析各个医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处和交往。李氏强调,每个当代社会都具有多个医疗健康传统,即既有现代科学医学,也有各种传统医学。科学意识形态的兴起加以学术及政治权威的倡导,现代科学医学常据有“结构优势”,在财富、权力和地位各方面皆高过传统医学。但是,民间的传统习惯和宇宙观,却使得各种传统医学仍具有颇大的“功能强度”,其服务广受信赖和应用。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利于传统医学的复兴。在学术及政治权威的重新支持下,传统医学的“结构优势”似乎提高,但种种的政策和措施其实是让现代医学以“科技研究吸纳传统医术”并“以行政架构吸纳传统医师”。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香港学者不甘于全盘接受或依附西方的社会学知识,尝试从实地研究中提出切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概念和命题。换言之,由“依附研究”转向“切合研究”(Lee R. 10992)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趋势。

能够在西方社会学之外建立切合中国社会实况的社会学,是应走的路向,当有助于理解和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但是,社会学中国化不等于孤立化或特殊化。费孝通(1988)经常强调,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要从实际问题出发,是对的。但是,这不是说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只能用于中国社会。大部分的香港学者是在中国社会成长的华人,但也曾留学欧美。他们既关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问题,也相信社会学知识应有普遍性。如何两者兼顾?常见的做法,就是把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特质概念化,使之适合于分析其他地区的社会。上面介绍的几个例子所提出的概念和命题,更不但切合香港的实况,而且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现代社会的发展。再举一例,我于1993年10月在香港及苏州的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会”上宣读论文,分析中国人的风水、缘份和容忍等传统观念并将之概念化为“能动宿命观”和“宿命能动观”,用意是理解在现代化过程中宿命主义与能动主义的配合,如何影响个人的社会适应及经济进取行为。我的做法,是从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出发,但力求对普遍性的社会学知识有所贡献。香港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学者,大都有同一志愿,就是使普遍性的社会学知识为中国社会服务,但也要使中国的研究有助于普遍性社会学知识的演进。(文崇一 1991; Chan 1991)

要使社会学研究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对全球社会学有所贡献,就要注意理论范典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当今的香港社会学界具有浓厚的实证社会学(Positive Sociology)传统,颇受结构功能论及理性选择论的影响,而且偏重抽样调查和数量化的变项分析。这种方法论有利于收集系统性资料,以验证假设和理论。但是,社会学的使命也要深入观察社会行为的动机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从而发现新的及适当的概念和命题。因此,除了抽样调查和数量分析以外,也要多作个案的田野观察、深度访问和定质分析并要加入象征交往论、日常语言分析及现象学等诠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的范典或方法。

费孝通在前述的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中,以“个人、群体、社会”为论文题目,回顾其一生的学术历程,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是实体,社会行为是发生在社会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但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也是实体,有其主动性。换言之,具体的个人,是有其理想、感觉和打算的,他的行为不全受社会制度所支配。个人固然很难跳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变也依靠着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因此,社会学的研究,不可“只看社会不见人”。这些见解,在西方社会学界也常出现,但费教授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十载的学术生涯和生活体验,最后郑重地提出要重视研究人的心态,就值得后辈学者再三反思。要研究人的心态,就不能单凭数量化的实证社会学研究而忽视其他研究途径,也不能只偏重理性的社会行为和制度而

忽视人的感情和愿望。

此外,中国社会的历史资料丰富,也可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大量材料,可惜,香港学人在这方面的研究(Lethbridge 1978;张德胜 1989)仍属少数。中文大学于1991年接收前述的“大学服务中心”,储存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献及当代资料,广受外国学者重视,但本地华人学者仍少应用,实属美中不足。香港也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以用来分析百多年来的殖民地政治格局及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香港社会学者却偏重当前的政治改革及社会经济变化,也是美中不足。

比较研究也是急需发展的。各地社会的相互比较,可以显露本地社会的特质,也可推进社会学知识的普遍性。近年来,香港学人相继与亚太其他地区的学者合作,比较不同地域的华人社会与非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有助于中国社会学与普遍社会学的并进。香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及美国的华人社会学者,于1993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华人社会阶层研究”研讨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始,也许可以带动比较研究。除了社会阶层的研究以外,家庭网络、两性关系、企业管理、教育取向、神巫观念、环境保护及医疗制度等也是值得比较大问题。但是,比较研究的发展,尚属初阶,有待加强。

现今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的巨流中。现代化由欧美蔓延到全球各地,尤其以亚太地区的发展最为瞩目。在此大时代的变动中,香港及邻近地区的学人应掌握机会,运用其社会学想象力,灵活应用各种研究方法,从比较的角度,理解广受关注和影响深远的大问题。社会学大师Peter Berger (1993)曾对当代社会学的发展提出四项批评:1. 狭隘的地域主义,缺乏比较各地发展经验的研究;2. 偏重琐碎问题和数量化的研究,不懂得追寻大问题和灵活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3. 强调社会行动的理性因素,忘记人有感性的、非理性的心态;4. 社会学分析的意识形态化,只求批判或改革社会,但不能保持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态度。这些批评,值得反思。

再者,当今的香港与邻近地区的社会学者正密切关注现代化的发展,但西方学者已开始关怀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Bauman 1992)一种不满现代社会的流弊、反叛现代主义的约束和要求个人自由的理性主义正在抬头,并且自欧美向全球各地散播。香港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学者,也许要谨记Berger的评语,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的大变动,作出相关的现代化或后现代的研究,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能够相互配合,甚至领导全球社会的发展和普遍性社会学知识的成长。

参考文献:

文崇一:1991,《中国的社会学:国际化或国家化?》,《中国社会学刊》第十五期,页1—28。

李沛良:1991,《香港家庭与亲属体系的变迁:回顾与展望》,乔健主编《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中文大学,页129—144。

李沛良、刘兆佳主编:1981,《人民公社与农村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李明望:1987,《变迁中的香港政治和社会》,香港:商务印书馆。

李明望、黄绍伦主编:1992,《社会学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

金耀基:1985,《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乔健主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香港中文大学,页133—146。

张德胜:1989,《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台北:远流图书公司。

乔健主编:1985,《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文化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1,《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黄绍伦编:1991,《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社会学的中国化》,李明、黄绍伦主编《社会学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页57—84。

杨国枢、文崇一主编:1982,《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费孝通:1988,《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鲍霁主编《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页12—23。

韩明谟:1987,《中国社会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萧新煌、蔡勇美编:1986,《社会学中国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Bauman, Zygmunt,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Berger, Peter, 1993, "Sociology: A Disinvitation?" *Dialogue*, No. 102 (April): 38—42.

Chan, David K. K., 1986, "The Culture of Hong Kong: A Myth or Reality." Pp. 209—230 in Kwan, Alex and Chan, David eds., *Hong Kong Sociology: A Reader*. Hong Kong: Writers' & Publishers' Cooperative.

Chan, Hoi-man, 1991, "On Urban Culture Formation: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a Hong Kong Agenda." *Annual of Japan Association for Urban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on Trends in Urban Sociology: Hong Kong and Japan, edited by Lau, Chong-chor and Takahashi, Yuetsu)*, December: 31—50. 1993, "Some Metasociological Notes on the Sinicisatio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1 (March).

Chaney, David C. and Podmore, David, 1974, "Family Norms in a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Hong Ko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6 (May): 400—407.

Cheung, Fanny M., et al. eds., 1991, *Selected Papers on Conference on Gender Studi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Tak-sing and Tam, Shuk-ye, 1984, "An Analysis of the Self-Esteem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Configurations and Determinants." *Occasional Paper No. 5*.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Yuet-wah, 1993,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in Hong Kong: A Comparison of Media, Family, School, and Peer Variables." *Occasional Paper No. 2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u, Stephen W. K. and Levin, David, 1993, "From a Labour-Surplus to a Labour-Scarce Economy: Challenges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1 (February): 159—189.

Choi, C. Y., 1975, "Urban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Hong Kong—A Case Study." In Goldstein and Sly, eds.,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Comparative Country Studies*. Liege: Ordina Edition for IUSSP.

Dwyer, D. J. ed., 1971, *Asian Urbanization: A Hong Kong Caseboo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Maurice, 1976, "A Report on Social Research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1963."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 191—261.

Hopkin, Keith, ed., 1971, *Hong Kong: The Industrial Colon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rvie, I. C. ed., 1969,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Johnson, Graham, 1977, "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an Expanding New Territories." *China Quarterly*, 69: 109—125.

King, Ambrose Y. C., 1978, "The Development and Death of Chinese Academic Sociolog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Modern Asian Studies*, 12: 37—58. 1981,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Pp. 127—146 in King, Ambrose Y. C. and Lee, Rance P. L. 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King, Ambrose Y. C. and Lee, Rance P. L. eds., 1981,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Kwong, Paul C. K., 1989, "Population and Immigration." Pp. 369—380 and "Emigration and Manpower Shortage." Pp. 297—338 in Tsim, T. L. and Luk, Bernard H. K.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am, K. C. and Liu, P. W. 1993, "Are Immigrants Assimilating Better than a Decade Ago? The Case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31.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au, S. K. and Louie, K. S. eds., 1993,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1988,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au, Siu—kai, et al., eds., 1991,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Ming—kwan, 1992, "Family and Gender Issues." Pp. 1—32 in Lau, Siu—kai,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Rance P. L., 197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Pp. 9—38 in Hsueh, S. S. ed., *Social Science &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Southeast Asia Experience.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80, "Perceptions and Uses of Chinese Medicine among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4: 345—375. 1982,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System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6: 629—642. 1985, "Social Stress and Coping Behavior in Hong Kong." Pp. 193—214 in Tsang, Wen—shing and Wu, David Y. H. eds.,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7, "Sociology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 17: 79—110. 1992,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y." in Nehane, C. and Chiao, C., eds., *Home Bound: Studies in East Asian Society. Tokyo: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Lee, Rance P. L. ed., 1981, *Corruption and Its Control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Lee, Rance P. L. and Lau, Siu—kai, 1993,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cademic Sociology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28.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thbridge, H. J., 1978,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ung, Benjamin, and Chiu, Stephen, 1991,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Strike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46—1989." *Occasional Paper No. 3.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vin, David, 1979, "Industrial Conflict in Hong Kong: Recent Trends." In *Social Tension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Arising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Asian Countries, edited by Japan Institute of Labour, Tokyo.*

Lin, T. B., Lee, Rance P. L., and Simonis, Udo—Ernst, eds., 1979, *Hong Ko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M. E. Sharpe.

Liu, William T. et al., 1993 Health Status,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Dementia among Elderly Community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Lui, T. L. and Chiu, Stephen, 1993,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Labour — Market Adjustment under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The Case of Hong Ko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5: 63—79.

Man, Peter J. L. 1992, "The Influence of Peers and Parents on Youth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 343—365.

Müchell, Robert E. 1972, *Family Life in Urban Hong Kong. Vol. I & II. Taipei: The Oriental Cultural Service*.

Ng, Agnes, 1975, "Social Causes of Violent Crimes among Young Offenders in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re Repo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g, Pedro P. T. 1981, "Soci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Fertility Decline." Pp. 235—254 in King, Ambrose and Lee, Rance, 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ocial—Demographic Patterns of Leisure Behaviour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4.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rish, William L. and Whyte, Martin K.,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laff, Janet W., 1981, *Working Daughter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pley, Marjorie (compiled), 1969,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n Hong Kong: Field Projects and Problems of Overseas Scholars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February 8—9, 1969).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raver, Harold, 1984, "Social Research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Pp. 224—243 in Birch, A., Jao, Y. C. and Sinn, E. eds., *Research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raver, Harold and Vagg, John, eds., 1991, *Crime and Jus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sang Wing—kwong, 1992, "The Class Structure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1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Educational and Ear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ttainment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23.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sim, T. L. and Luk, Bernard H. K. eds., 1989,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rd, Barbara E. 1985, *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ong, F. M., 1975, "Industrializ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7: 958—1000. 1981, "Effects of the Employment of Mothers as Marital Role and Power Differentiation in Hong Kong." Pp. 217—233 in King, Ambrose and Lee, Rance, eds.,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ong, Siu—lun, 1979,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migration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32, 10 (October): 918—933.

Wong, Thomas W. P. and Lui, T. L., 1992a, "From One Brand of Politics to One Brand of Political Culture." Occasional Paper No. 1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b, "Reinstating Class: A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y of Hong Kong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No. 10.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Morality, Class and the Hong Kong Way of Life." Occasional Paper No. 3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gel, Ezra F.,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唐 军

厦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立

经国家教委批准,1993年12月厦门大学哲学系正式建立社会工作专业。

厦门大学哲学系自1985年开始筹办社会工作专业。1988年创办社会工作与管理并开始招收本科生,至今已招收6届本科生共107人,已毕业两届40人,目前有在校生67人。除本科生外,该系还不断拓宽培养方向,走多渠道办学的道路。自1988年以来,该系将原来的党政干部基础理论专修科改为社会工作与管理,目前该专修科在校生有24人。1993年该系还招收了32名社会保险与管理专业的自费大专生。最近,经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批准,该系成为全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自学考试的第一个主考(包括命题)单位。

目前,厦门大学哲学系已组建了社会工作教研室。该研究室现有教师7人,其中副教授4人,讲师2人,助教1人。为了搞好教材建设,社会工作教研室已与厦门大学出版社商定出版一大社会工作丛书,在三年内先出第一批,共十种。这将是国内一套比较系统的社会工作教材。

(胡 荣)